



秦至清代湖北人口迁移特征析论

宋传银

摘要：秦至清代湖北移民以生存型和发展型移民为主，秦至明代以迁入为主，清代以迁出为主。秦至宋元时期，湖北移民主要来源于北方各省，明代主要来源于江西。各区域人口迁移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便利的地理位置，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相对优越的发展空间，是影响移民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湖北；人口迁移；移民类型

历史上湖北人口迁移频繁，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几类著作：一是中国移民史的通论性著作，如葛剑雄主编的六卷本《中国移民史》^①，其中有些部分涉及到湖北地区的人口迁移。二是湖北通史类著作，如章开沅主编的《湖北通史》等^②，该书各卷中均包含有各时期湖北地区人口迁移的内容。三是区域移民史著作，这一类著作以张国雄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为代表^③。该书利用族谱和方志资料（主要是族谱）研究明清时期的两湖人口迁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移民史的通论性著作中，湖北地区的人口迁移虽有涉猎，但并不是这类著作研究的主体。湖北通史类著作一般以时代分卷，从中难于看出整个历史时期湖北人口迁移的过程及其特点。《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等区域移民史著作所涉及的时段显然是有限的。因此，在中国移民史的大背景下，全面审视历史上湖北人口迁移，探讨其发展过程、特点及其规律，仍有必要。本文以秦至清代为时间断限，从移民类型、移民过程与阶段性、移民来源与空间分布、移民的地域差异、影响移民的因素等方面探讨湖北人口迁移特征。

一、移民类型

根据移民的性质、民族、迁移方向、迁移方式、迁出地和迁入地、迁移时间等几个方面，现今学术界将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分为以下五种主要类型：自北而南的生存型移民、以行政或军事手段推行的强制型移民、从平原到山区从内地到边疆的发展型移民、北方游牧民族或非华夏族的内徙与西迁、东南沿海地区对海外的移民等^④。就历史上湖北移民而言，其类型主要有生存型移民、以行政或军事手段推行的强制型移民和发展型移民。

生存型移民是为了生存而向其它地区迁移的移民类型之一，其迁移动因源于移民原居地的推动力，如原居地发生了自然灾害，爆发了战争等，其迁移的目的在于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所以这种类型的移民迁移的目的地并不十分确定，往往只是一个大致的方

①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② 章开沅：《湖北通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③ 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④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 1 卷，第 54 页。

向,遇到安全之处,就会安顿下来。一旦原居地的自然灾害或战争结束,他们往往会返回原居地。如果自然灾害或战争持续的时间较长,他们在迁居地定居若干年之后,就会成为移民。这种生存型移民主要发生于元明之前,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北方人口南迁的高潮(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及靖康之乱之后),均是这种生存型的移民。湖北在地域上处于我国南北交界之处,每当发生这种由北而南的移民运动时,湖北地区往往就要迁入一定数量的移民。

湖北地区生存型移民的特点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时间跨度长。湖北地区生存型移民从先秦跨到明代之前,在几种类型的移民中,这种生存型移民的时间跨度是最长的。第二,移民迁出地集中于今北方各省。长期以来,我国政治中心位于北方,经济开发的重点在北方,人口分布重心也在北方,自然而然北方发生自然灾害和战争的几率就较南方为大,因而迁入湖北的移民自然以北方地区为多,其中尤其以今河南、陕西、山西等地居多。第三,迁入湖北的生存型移民以迁居今襄阳、荆州、武汉等中心地区为最多。这与这种类型移民的特点有关。如前所述,这一类型的移民主要来自于北方,其迁移目的地并不十分明确,而当时沿汉水南下,是当时主要的一条交通线,所以当他们到达襄阳等安全之地之后,就会安顿下来。如永嘉之乱之后,大量北方民众迁入湖北地区,政府在这里设置了一批侨州郡县。当时迁入湖北的移民主要集中于三个区域:一是江陵、松滋一带,侨民多来自山西、陕西、河南,也有少量的江苏、安徽和淮域之民。二是武昌、黄梅一带,侨民来自河南,亦有安徽之淮北人。三是汉水流城,上自鄖西、竹溪,下至宜城、钟祥,以襄阳为中心。移民较其它二区为多,以来自陕西省者最多,河南、甘肃次之,河北、山西、安徽、四川又次之^①。安史之乱爆发后,《旧唐书》卷39《地理二·山南东道》称:“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节度使。”据《三朝北盟会编》卷64记载: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兵进犯山西、河北,直逼开封,“士庶携老提幼,适汝、颍、襄、邓逃避者,莫知其数”。第四,迁移时间集中,迁移规模较大。因自然灾害或战争的爆发一般具有短时而突然的特点,受其影响,这种类型的移民往往时间上比较集中,如前述的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及靖康之乱爆发之后的时段。加之迁移的方向上的一致性(即都往南方迁移),因而迁移规模较大,如上述三次北人南迁移民运动就是我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

以行政或军事手段推行的强制性移民,在中国移民史上相当普遍,这种类型的移民方式有:其一,将罪犯强制迁到某一地区,其中包括官员,也包括百姓。其二,将一个地区的普通百姓、官员强制迁到另一地区,如在一个政权的初期,如果京师人口太少,为了巩固新的政权,统治者往往将其它地区的百姓迁移至京师,这就是所谓的“实京师”政策。为了巩固边疆,有时也会将百姓迁往边疆,这就是所谓的“实边”政策。其三,战争双方相互掠夺对方人口。其四,消灭一个政权之后,胜利者将被消灭者境内的人口迁走等。这种类型的移民在湖北均有发生,如元代曾将安南(今属越南)国王及其部属迁到汉阳^②,六朝时期湖北境内的政权对人口的争夺。从秦汉至唐代,政府都曾将鄂西北作为强制性移民的迁入地。如秦始皇时,将嫪毐及其党羽迁到今房县,西汉时将犯罪的刘姓同姓王也迁移到这里^③。这种类型移民的特点为:第一,规模较小。其迁移的人口数量较少,有时是几个人,有时是一个家族,其人口数量远远不能与其它类型的移民相比。第二,迁居地较为特殊。一般为较为偏远之处,如湖北的房县多次作为这种类型移民的迁居之地。第三,迁移时间分散。第四,移民来源地点分散。这种类型的移民在湖北移民史上并不占重要地位。

发展型移民与前两种移民类型不同,它们迁移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存空间。出现这种类型移民的原因在于全国不同区域的人口和经济开发状况。我国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各地人口分布状况不尽相同,经济开发的难易程度有大有小,所以各地域之间在开发序列上存在着先后之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土地开发的不断深入,经济开发水平较高,土地开发殆尽之地就会存在一定的人口压力,其百姓就会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向尚有开发潜力的地域迁移。一般而言,这种类型的移民往往从平原迁往山

^①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载谭其骧:《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83页。

^② 皮明麻:《武汉通史》第3卷,武汉出版社2006年,第193页。

^③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5页。

区,从内地迁到边境,从农村迁往城市等。

与上述生存型与强制型移民相比,发展型移民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第一,发展型移民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湖北生存型和强制型移民出现的时候较早,特别是强制型移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详下)。比较而言,湖北发展型移民在时间上要晚得多,它最早只能追溯到北宋中期,当时鄂北岗地出现了前来垦荒的长江上游地区的移民^①。到了明初,出现了众所周知的“江西填湖广”的移民运动;明代中叶,荆襄山区聚集了数以百万计的流民,并爆发了流民起义,最终政府允许愿意留在当地的流民附籍,并设置了新的郧阳府来管辖这些新的“编户齐民”;清初改土归流之后,大量移民迁居鄂西山区;明清时期,随着汉口等城市发展,大批移民迁入汉口等城市,成为新的城市居民。第二,移民持续的时间较短。发展型移民虽说最早出现在北宋,但当时数量还相对较少,其鼎盛期则出现在明清时期。这种类型的移民持续的时间比前两种类型要短得多。第三,迁移时间不如前两者集中。开发型移民主要源于两种力的相互作用,一种力是迁居地的拉力,即迁居地存在着良好的发展空间,对他们起着吸引作用。二是原居地的推力,即原居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人口压力,推动这些人去寻找新的优越的生活空间。无论是推力还是拉力,都不是瞬间出现的,一般都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所以就决定了这种移民在迁移的时间上并不特别集中。如前述明初的“江西填湖广”、明中叶的荆襄流民运动、清初的移民迁居鄂西山地,每一次所持续的时间都较长。如荆襄移民浪潮的发轫要到明初的洪武(1368—1398年)、永乐(1403—1423年)年间,并不只局限在明代中叶,只是在中叶时达到了高潮,其结束一直要持续到嘉靖(1522—1566年)末年,前后持续将近200年。同样,我们之所以称明初的“江西填湖广”,只是因为这场移民运动的高潮发生在明初,但这场移民运动不只是到明初就结束了,而是一直延续到明末。可以说,整个明清时代,湖北就一直在接受这种类型的移民,即使是在清代发生“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之后,仍是如此,只不过规模没有明初那样大而已。清初向鄂西山区的移民要追溯到明末,高潮在乾隆(1736—1795年)时期,但也一直持续到咸丰(1851—1861年)年间。第四,移民来源地发生逆转,不再以北方移民为主,而是以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下游的移民为主。

二、移民过程与阶段性

对历史上湖北移民过程的阶段划分可以有多种标准。

如果以移民迁入与迁出作为标准,可以把秦至清代的湖北移民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秦至明末(1644年以前)。这一阶段湖北以移民迁入为主。换言之,这一阶段湖北在主体上一直充当移民接受者的角色,虽然其间也存在着人口迁出,如三国时荆州人士随刘备入蜀、北入曹魏;六朝时将俘获的蛮民迁往首都建康;宋元对峙时期,元军在征服湖北的过程中,将征服地的人迁往北方等。但其规模远远不能与人口迁入相比。这些移民迁入还可以上溯到先秦时代,如夏商移民湖北^②、楚人的先祖移民江汉地区^③、楚国在疆土扩张过程中将灭掉的部分国家的人口迁移今湖北地区^④、今土家族的源头——巴人迁入鄂西地区等^⑤。这一阶段中,比较典型的移民事例有六朝时期因战乱导致的北方生存型移民的迁入、唐代安史之乱和宋代靖康之乱后的北方移民南迁、明代初年以江西人为主体的移民迁移湖北地区等。第二个阶段:清代(1644—1911年)。这一阶段湖北以人口迁出为主。这一阶段虽然也存在着人口迁入现象,如清初移民迁入鄂西山地,商业性移民迁入汉口等,但这一阶段湖北以人口外迁为主,除了我们熟知的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之外,这一阶段湖北移民广泛分布于长江下游的安徽、江苏等省,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等省,以及东北地区等。

如果以移民的类型作为标准,可以把湖北移民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秦—元代):以自北

^①陈钩等:《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91页。

^②张正明、刘玉堂:《湖北通史》第1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3页。

^③张正明、刘玉堂:《湖北通史》第1卷,第209页。

^④何光岳:《楚国的灭国与移民》,载《求索》1981年增刊。

^⑤向国成:《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志》,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而南的生存型移民为主体。这一移民特征与全国的一样,因为从全国来说,“这一阶段移民的主流是北方黄河流域向南迁往长江流域及更远的地区”^①。第二个阶段(明一清代):以发展型移民为主体。如前所述,湖北的发展型移民最早出现在北宋中期,但这种类型移民的规模还很小,不能与生存型移民相比。到了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发展型移民开始占据主体地位。这一阶段江汉平原和鄂西山地因存在着广泛的开发空间,成为湖北地区的重点开发区域,吸引着广大的发展型移民。汉口在明代中叶兴起之后,迅速成长为一个新兴的大都市,因存在着良好的发展空间,成为人们(特别是商人)趋之若鹜的乐土。

如果以移民的地域来源作为标准,可以把湖北移民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南北向移民阶段。这一阶段从先秦一直持续到宋元时期,湖北地区的移民主要来自北方地区。第二个阶段:东西向移民阶段。这一阶段为明清时期。这里所称的东西向移民指的是沿长江流域的自东向西的移民。这种类型的移民早在六朝时期就已经出现,前述永嘉之乱后的人口南迁中,湖北地区就接纳了部分安徽、江苏地区的移民,但这不是当时湖北移民的主流。到了唐宋时期,特别是宋代,随着长江下游的开发,出现了由长江下游向中游湖北的移民,主要是发展型移民。此后,这种东西向的移民便成为湖北移民的主流,包括江西填湖广、向荆襄地区的移民、湖广填四川等。

移民之所以会产生上述种种阶段特征,与湖北的人口与经济开发状况相关。清代以前,湖北人口发展一直非常缓慢,区域人口数量较少,宋代以前,湖北人口一直保持在160—500万之间,明代中叶达530余万。总体上属于地广人稀的状况,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开发空间,所以能够接受相当数量的外来人口。同时,这些外来的移民迁入湖北之后,也能够依存较大的开发空间而生存下来。到了清代,湖北人口飞速发展,估计到乾隆中叶已突破1000万,乾隆末年突破2000万,道光(1821—1850年)前期突破3000万。湖北地区已人满为患,出现了“人浮于土”的现象,不仅不能接受外来移民,而且还被迫向外迁移。

三、移民来源与空间分布

在上节中,我们以移民的来源地为标准,将湖北移民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即明代之前,因其主流是南北向移民,所以湖北移民主要来自于北方各省。不仅属于移民主流的南北向移民是如此,不占主导地位的强制性移民,也是这样。湖北地区的土著居民是三苗,夏代时,禹征三苗之后,对其故地委派夏人前往统治。如以宜都石板巷子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器物组合,与同一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少有联系,却几乎涵盖了以今河南临汝煤山遗址为代表的中原地区煤山文化的全套器物组合;在黄陂盘龙城也发现了二里头文化^②。在楚国进行的灭国移民中,迁入湖北的移民绝大多数来源于今河南,只有少数来源于今安徽。永嘉之乱后的北人南迁高潮中,迁居湖北的侨民大多来自山西、陕西、河南,只有少数来自江苏、安徽等地。安史之乱后的北人南迁高潮中,“尽投江、湘”的是“襄、邓百姓”和“两京衣冠”,显然也是以北方人为主。靖康之乱爆发后,宋代庄绰《鸡肋编》卷上中有一形象的说法:“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当然也以北方人为主。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一些族谱及地名志的记载,一些地区特别是鄂东地区,江西移民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了^③。南宋时期,更有长江下游狭乡百姓迁往湖北地区从事垦荒,成为发展型移民,这就是《宋史》卷 174《食货二》中所记载的:“今湖北惟鼎、澧地接湖南,垦田稍多,自荆南、安、复、岳、鄂、汉、沔汚莱弥望,户口稀少,且皆江南狭乡百姓,扶老携幼,远来请佃,以田亩宽而税赋轻也。”

到了以东西向移民为主的明代，湖北移民主要来源于江西。根据曹树基先生的研究结论^④，明初洪武年间湖北地区 174 万的总人口中，移民人口占 57%，约为 98 万，其中江西籍移民占 70%，所以洪武移民重建了湖北的人口。

^①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1卷，第45页。

^②张正明、刘玉堂：《湖北通史》第1卷，第183页。

^③湖北省武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济县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年，第95页；黄梅县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湖北省黄梅县地名志》，黄梅县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1985年，第429、472、473、482页。

^④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5卷，第148页。

移民来源地的不同，移民在空间上的分布也就不一样。在前一个阶段，移民主要集中于荆襄一带。如据《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等文献记载的户口资料，襄州、鄂州的元和户较天宝户分别增加了124%、101%，位于全国所有州郡之首，可见这一次的移民主要集中于长江中游，特别是荆襄一带。

在后一个阶段，因移民主要来自于江西，所以移民分布最多的是鄂东，江汉平原次之，鄂西又次之。

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格局，是因为它与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开发的地域格局有关。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是在唐宋时期，随着这种格局的变化，南方的经济开发将进一步发展，经济地位会进一步上升，相应地人口容量也会不断增加，北方人口自然而然地迁往南方。所以说，自北而南的移民迁入湖北境内，表面上看与北方的战乱有关，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格局。只不过战乱、自然灾害等因素强化了这种迁移过程。同样地，北宋中期长江下游的发展型移民迁往荆襄，明初江西移民迁往湖北，明中叶移民聚集荆襄，清初形成“湖广填四川”的移民高潮，移民运动沿长江流域自东向西发展，实际上也是长江流域经济开发从下游至中游再到上游拓展的一个反映^①。

四、移民的地域差异

就湖北区域而言，历史时期的移民还有地域上的差异。要全面认识这一问题，还必须从空间上加以分析。根据湖北地域特点，我们把它分成四大区，即鄂西北区、鄂西南区、鄂中南区（江汉平原区）、鄂东区^②，每一区的历史人口迁移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一）鄂西北区

鄂西北区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区域，一是现今的十堰市，二是现今的襄阳市和随州市。

十堰市的早期移民可以追溯到史前，蛮、苗、巴等族各支系沿着汉水干支流，迁移到今十堰市，成为这里最早的移民。在新石器时代，来自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来自长江中游特别是汉水下游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在这里汇合，而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已深入到达鄂西北汉水支流南河、堵河的上中游谷地。楚人沿着丹水从陕西商洛迁入到丹淅之地，再迁襄宜平原。春秋时期，位于今竹山的上庸国，是由梁徙荆，而介于巴与秦、楚之间。前述楚人灭国移民中，有霍国由河南临汝迁到今竹山。如前所述，从秦昭襄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73年）一直到汉武帝时代，这里长期成为强制性移民的迁入地，迁入者先后包括南阳免臣、长信侯嫪毐、吕不韦舍人、被秦始皇所灭的赵王、汉代济川王等八王。东晋南朝时期，这里是永嘉之乱后北方移民迁入的三个区域之一，但以襄阳为中心。唐代，政府将均、房之地作为宗室流放地，流放者有太宗子李泰、中宗子重福等。在唐、宋时期两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中，十堰市已少见移民迁入。直至明清时期，这里才成为移民迁居的热点地区。

与十堰市不同，襄随地区一直是移民迁居的热点地区，无论是自北而南的生存型移民，还是发展性移民，这一地区都有分布。如先秦时的楚国灭国移民、三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高潮、明初的江西填湖广、明中叶的荆襄流民等。

（二）鄂西南区

这一地区历史上很长时间内并不是移民迁入的热点地区，文献记载只有少量的汉人进入山区，不过大多是本省之人，直到清代改土归流之后才有所改观。

（三）江汉平原区

先秦时期夏人、商人南下时，估计有部分移民到达江汉平原边缘，楚国灭国移民时，有复、江等国迁入这一地区。在此后长时段的北人南迁过程中，本区是移民迁入的重点地域之一，六朝时荆州是独自相对安全的乐土，永嘉之乱后江陵、松滋一带是湖北接纳移民的三个重点区域之一，安史之乱、靖康之乱后本区也是北方移民集中之地。此后，随着江汉平原的大规模开发，也有相当数量的发展性移民进入本区。

（四）鄂东区

在长时期的北人南迁移民运动中，鄂东区也是一个移民迁入的重点地区，永嘉之乱后的北人南迁高

^①宋传银：《移民与古代湖北的经济开发》，载《中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②叶学齐等：《湖北省地理》，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

潮中,武昌、黄梅成为湖北移民集中分布的三个区域之一。隋唐时期,随着鄂州(治今武汉市)地位的提高,移民也相应迁入较多。但整体比较起来,在明代以前,在以北人南迁移民运动为主的时期,鄂东区的移民数量与地位并不如荆襄地区,这与经济发展的水平有关,与地理位置有关,也与移民的来源有关。明清时期,随着移民来源的改变,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鄂东区的移民地位日显重要。这一时期的“江西填湖广”的移民运动中,移民的分布就以鄂东区为最多,依次由东向西递减。麻城成为一个显赫的移民迁入地和中转站,迁入麻城的江西移民在清代又大规模迁往四川,成为“湖广填四川”的重要移民来源^①,以至于“江西麻城”成为一个特殊的地名。随着移民的迁入,汉口作为一个移民城市而兴起,商业日见繁荣^②。

五、影响移民的因素

为什么湖北在历史上能长期充当移民接收者的角色,而在明清时代其角色又发生了逆转?这与湖北特殊的自然地理因素与人文因素有关。

(一) 通达便利的地理位置

湖北在历史上能成为移民迁入区,与其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在中国移民史上,移民迁入湖北的路线大致有南北线和东西线。南北线的移民主要发生于明清以前,移民以北方移民南下为主。东西线的人口迁移从唐宋时代开始,移民沿长江自东向西迁移。南北线与东西线的人口迁移并非截然分开,在时间上相互重叠之处。无论是南北线移民,还是东西线移民,受地理位置的影响,都会有移民迁入湖北地区。

在北人南下的移民迁移路线中,一般有东、中、西三线^③,进入湖北的移民迁移路线属中线。换言之,湖北是中线移民的必经之地。以唐宋时期为例,唐代后期北方移民“中线北端起自关中和华北平原西部,分别连接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汇于邓州(今河南邓州市)和襄州(今湖北襄樊市)一带,即可分水陆两路南下。陆路经过荆门和江陵,渡过长江,从洞庭湖西岸进入湖南,到达岭南。水路经汉水、长江运道。安史之乱后,由于河南境内的汴河漕运经常不畅通,一度改由自长江转入汉水,再经洋州(今陕西洋县)、梁州(今陕西汉中市)转陆运。江汉运道的繁忙,导致扼水运人口的鄂州移民剧增,地位上升。”^④

据研究,宋代北方移民从中原进入湖北地区也属于中线,主要有三条道路。一为中路,从今河南中部大致经今京广线一带进入。一为西路,从南阳盆地进入襄阳以后,往南可入江陵,往东南可入汉阳一带。一为东路,从淮南的西部经蕲州(治今湖北蕲春市东)、黄州(治今黄冈市)而入^⑤。

总之,北方移民进入湖北,其迁移地点大多首先选择襄阳和荆州,然后再南下到今武汉地区。

唐宋以后,南方经济较北方发达,人口重心也在南方,全国性的自北而南的人口迁移结束。自六朝以来,长江流域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唐宋时期长江中游落后于下游,就中游而言,江西的经济发展要高于湖北,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出现了长江下游的人口迁移湖北,以及明初“江西填湖广”的移民运动,沿长江流域自东而西移民湖北的格局形成。

(二) 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

战争通常会引发人口的大规模迁移,战争频发之处就成为移民的迁出地,而相对安全之地则成为移民的迁入地。在以生存型移民为迁移主流的时期,湖北地区相对北方而言较为安全,从而成为移民的乐土。据研究^⑥,从公元前221年至1840年,以战役为基本单位,共发生战役840例,若以秦岭淮河一线划分南北,则北方发生战役644例,占战役总数的77%;南方196例,占23%。就内部战争(国家分裂状态下中原与周边地区的战争)而言,共发生373次,其中河南120次、陕西74次、山东30次、山西72次、河北78次、湖北19次。外部战争(国家一统状态下中原与周边地区的战争)467次,其中河南59次、陕

^①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5卷,第157页。

^② 罗威廉:《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2页。

^③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4卷,第417~422页。

^④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3卷,第350页。

^⑤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4卷,第420页。

^⑥ 李燕如、胡兆量:《中国历史战场地域分布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载《人文地理》2001年第6期。

西 44 次、山西 53 次、河北 64 次、湖北 0 次。总的说来，黄河流域及长江以北的地区是中国内部战争的频发地带，其中心包括河南、陕西、江苏、山东、安徽等省。外部战争大多发生在北方边境省份，中心位于甘肃、河北、陕西、河南、新疆、辽宁、青海等省。

可见，历史上湖北的战争相对较少，生存型移民往往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战乱时只要离开战乱之地即可，因而相对安全之地便成为他们迁移的首选之地。这在南北线移民的迁移中有明显的表现。

（三）相对优越的发展空间

生存型移民的迁移目的在于寻求安定的生存环境，但这些移民能否在迁入地生存下来，那就要求迁入地具备相应的生存空间。就农业地区而言，迁入地必须有相当数量的可开发土地，可供外来移民垦殖；就城市而言，它必须有发展工商业的良好空间，移民能够依托工场和市场生存下来。发展型移民迁移的主要原因在于迁入地的吸引力，这个所谓的吸引力也是迁入地的相对优越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其它地区都已开发殆尽，并人满为患的情形下，这些相对空闲之区就会成为移民的聚集之区，而不管这一地区是难于开发的湖荡，还是交通并不便利的山区。

历史时期湖北能够成为移民（无论是生存型移民还是发展型移民）接纳之所，除了上述地理位置与相对安定的环境之外，关键在于湖北具有移民所需要的生存空间。清代以前，湖北人口发展缓慢，相对来说是人口稀疏之地。特别是在战乱之后，会留下大量的抛荒土地，移民很容易能够生存下来。明代人包汝楫在《南中纪闻》中曾发出了“海内旷土总不如湖广之多，湖广真广哉！”的感叹。直到弘治初年，丘浚在其《江右民迁荆湖议》中仍然认为“以今日言之，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明初出现的“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浪潮，也与这种因素密切相关。明代中后期荆襄流民的产生就与荆襄地区优越的生存环境所产生的吸引力有关。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72 中描述说：“其地多崇岗丰箐，川险林深，中间仍多平旷田地，可屋可佃，更产银矿砂金，可淘可采。”汉口的情形也能说明这一点。汉口兴起之后，在明末成为四大名镇之一，商业发达，吸引了大批商业性移民，这部分移民是为了追逐商业利润而迁入的。其中一部分商人经过一代、二代之后，就慢慢由客贩变为定居了。《紫阳书院书略》卷 8《杂志》的一段记载为此作了很好的注脚，“汉镇距吾乡仅一彭蠡耳……吾乡六邑人士，以其地利之美，食货之繁，挟英而游者比比也。丛集萃处，久而安焉。”

An Analysis of the Mig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ubei from Qin to Qing Dynasty

Song Chuanyin (Associate Professor, Jiang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ainly immigrants of Hubei were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mmigrants from Qin to Qing Dynasty. They moved into Hubei mainly from Qin to Ming Dynasty, and moved out Hubei mainly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Hubei immigrants came from the Northern provinces from Qin to Song-Yuan Dynasty, and came from Jiangxi in Ming Dynasty. The regional population migration ha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he convenient location, relatively stabl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relatively favorable development of space were the main factors which effected the immigrants.

Key words: Hubei; immigrants; migrant types

●作者简介：宋传银，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湖北 武汉 430056。

●责任编辑：桂 莉

